

5 | བོད་ཀྱི་ཤེས་དཔལ་ཞིབ་འཇུག

藏学研究



མི་རིགས་དཔེ་མཁན་ཁང་།
民族出版社

བོད་ཀྱི་ཤེས་དཔལ་ཞིབ་འཇུག

研究



5 | མི་རིགས་དཔེ་མཁན་ཁང་།
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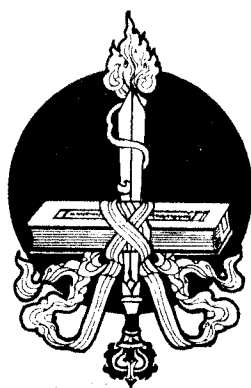
98
K297.5
17

༡༡། །བོད་ཀྱི་ཤེས་རིག་ཞིབ་འཇུག།

藏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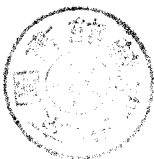
(དབ་དགུ་པ།)

(第九集)



ཨི་རིག་ས་དབེ་སྒྱུ་ན་ཁང་།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学研究(第9集):汉、藏文/中央民大藏学系编. -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8.2

ISBN 7-105-03093-3

I. 藏… II. 中… III. 藏学-研究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3759 号

16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东方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324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625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5.00 元

该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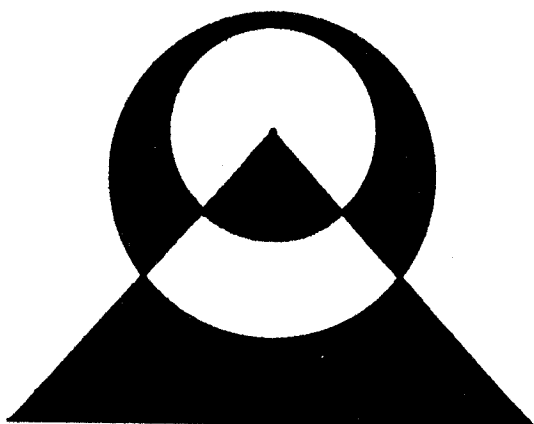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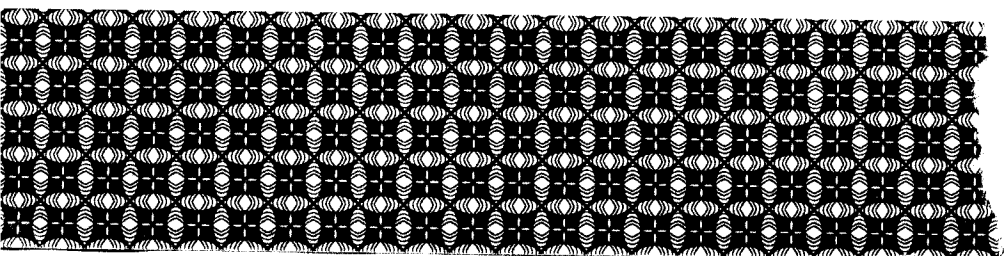
བོད་ཁྱིམ་ཤིག་གི་འཕུག
藏 学 研 究

༡༡། །དེབ་རྒྱུ་འདི་ཉིད་ཀྱང་དབྱར་མི་རིགས་སློབ་གྲྭ་ཆེན་མོའི་
བོད་ཡིག་ཆན་ཁག་གི་བཅུགས་སྟོན་ལོ་འཁོར་
ཁྱེད་ཀྱི་ཁྱེད་ཀྱི་ཕུལ་བ་དགེའོ། །

谨以此论文集献给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
成立五周年纪念。



བོད་ཀྱི་ཤེས་རིག་ཞིབ་འཇུག
藏 学 研 究



13A29/16

序 言

中央民族大学是全国百所重点大学之一,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藏学系是中央民族大学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系科之一,它的建立和发展体现了我们国家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重视和关怀。今年三月二十日是藏学系建立五周年纪念日,该系切吉卓玛老师要我关心和支持藏学系及其事业的发展,我做为藏族的一个成员,为藏学系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甚为高兴,也从内心深处感谢为藏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贡献和为之辛勤劳作的各族老师。

今天藏族拥有光辉灿烂的文化,是离不开我们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耕耘,他们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雪域文化,对藏族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她那源远流长的文化,犹如珠穆朗玛峰,更具有独特的迷人的色彩;犹如布达拉宫,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绚丽多彩;犹如长江黄河,连接着中华民族之文化。

今天藏学事业的蓬勃发展,甚至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同样离不开各国、各民族藏学专家和学者们所奉献的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他们以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开创了新的学科领域,使古老的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学科领域中辉煌灿烂。是他们将藏学事业推向世界,推向新的理论高度和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历史的车轮在一日千里地前进,社会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人类的思维从幻想寄托中回归到现实发展之上。几千年沉积的藏族的精神和文化,在继承其高尚的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甚需注入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只有这样方可称得上继承和发展。我特别希望在藏学学科或藏学研究领域中,要重

视观念更新的问题,将过去的出世思想,等待解救的思想,安于现状的思想引入到积极入世,自强自立,优胜劣汰的现代竞争意识之中。要重视语言文字现代化的问题,即要搜集编译现代科技术语和现代词汇,通过母语将现代科学知识传播到广大农牧民群众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要重视创作高品味的时代文学艺术作品问题,改变目前几乎没有或颇有新的创意性的藏族文学艺术作品等作品。要重视研究藏传佛教适应现实社会的问题,佛教的思想和文化对藏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部份。佛教的慈悲、善良、宽容、无私、利乐有情的思想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藏区的繁荣和发展与宏法的因缘相结合。要重视研究藏族现实社会问题,即对藏区资源丰富和贫穷落后的矛盾,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科技人材与非科技人材的社会需求问题,自然经济推向市场经济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等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是研究和教学融为一体的单位,具有高层次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一定能够为藏民族的繁荣发展,富裕文明做出更大贡献。在此衷心希望藏学系犹如辽阔的草原,以自己宽广的胸怀,摄取阳光的温暖,接受春风的拂动,汲取江河的滋润,迎接雨水的洗涤,滋养出绿绿的青草,艳丽的鲜花,把我们祖国的大草原装扮得更加秀丽。

青海民族发展基金会会长
堪志·次成洛周

克服惯性思维影响 推动伟大事业发展

(代前言)

丹珠昂奔

从事业看,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从干部看,除去基本政治立场等不论,思维能力也是一种“决定的因素”。我们现在讲“大思路”、“新思路”、“构思”,都涉及到思维问题。

在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是抽象思维发展的两个阶段,逻辑思维是以感性认识为前提,从完整的表象过渡到抽象的阶段;辩证逻辑思维是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意思的。整个悟性活动……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种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相反地,辩证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客观世界是在有规律的辩证的运动着的,因此我们的思维也只有有规律的辩证运动,才能认识、驾驭和改造客观世界。归纳和演绎、抽象和具体、分析和综合、定性和定量、时间和空间、静态和动态的多种多样的思维方法也充分地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以及建国以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在我们的国民思想中,尤其是在我们的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不良的思维惯

性,这些思维惯性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选择、行为方式,也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决策,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有必要进行清理和充分地认识,使我们自觉地克服这些有害的惯性思维,从而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们伟大事业的向前发展。

我以为有四种思维惯性在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事业和决策。这四种思维惯性是:

一、“左”比右好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党为“左”的思想所困扰。“左”的思想之于我们党,其特点有三:一是历史久远。建党第六年,即1927年“八·七”会议瞿秋白成为党的负责人,即行“左”倾路线,此后有李立三、王明的“左”倾路线。建国后,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后来的十年“文革”,从理论到实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将“左”的一套推向高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是破坏性大。暴动造成诸多无为牺牲;苏区的大肃反抓AB团冤死不少壮士;五七年反右,数十万知识分子蒙冤;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损失惊人;“文革”浩劫,更是空前绝后。三是影响深远。至“文革”时,从内涵到形式,都形成了一种“左”好右坏,“左”是革命,右是保守、反动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一种越“左”越好,越“左”显得越革命,越革命就需要越“左”的荒唐逻辑,甚至出现了“左”派整所谓的右派,“左”派中的极“左”派又整“左”派的现象。政治的生活化,使“左”的思想、意识、作风、行为普及到了中国社会的千家万户、各个角落,影响了几代人。“左”的思想沉淀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中,便有这种“左”的思维定势。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对“左”的一套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但是,长期形成的“左”行保险,右行危险的思维惯性,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仍然如隐形伴侣悄然左右,仍然成为我们进行伟大事业的严重障碍。比如在理论上,一些人还在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的解释,从概念和一般结论出发,仍然倡导那种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

所谓“社会主义”，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上，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其心理深层仍然留恋“大锅饭”，因为吃“大锅饭”舒服、保险；吃“小锅饭”，搞市场经济辛苦、有风险。有的人至今一谈搞建设、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无精打彩，但一听到抓“阶级敌人”、搞运动、斗争就来劲，就来神；有的人到今天，甚至“革命”的词语不改，“革命”的宝像不变，一有风吹草动，便兴那么一点风浪。“左”的一套东西对新一代人的影响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估计是不充分的，以为时代变了，新一代早就与“左”的一套“相揖别”了。实际不是这样。新一代人虽然旧的框框少些，但这种心理的惯性不是没有。举一我亲历的事：

我到某学校去参加家长会，老师在讲评作文时说，现在的孩子言词大人化、文章概念化的情况比较普遍，不论写什么文章，前面写一段，中间写一段，最后几乎都要拖一个“光明的尾巴”（我说这是“革命”的尾巴，“文化大革命”的尾巴）：“这时我想到了英雄某某”、“我要刻苦学习，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等，有的甚至写上了“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的豪言壮语。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是说明“左”的东西还在传播吗？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大多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他们能写出这样的话，完全是家长甚至是老师“传、帮、带”进行辅导的结果。进一步从深处去看，我们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是在教孩子说假话吗？小孩说假话怎么得了！教孩子说假话，不就是教孩子当骗子吗？自己扮演的角色，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清楚的。小孩说假话，根子在大人。可是现在的上小学三四年级学生的家长大多是生在“文革”，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左”的余毒因何如此之重？这些人如此，在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呢？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同样存在着这些东西。有的同志讲这是一种怪现象，实际上这种怪现象也不怪，这如同一个人得了一场大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种观念意识、一种文化哲学进入人们的思想可能是汹涌而

人的,但当它在人们的思想上生根之后,要清除,那就需要一点一滴长时间地做工作,因为文化之潮,思想之潮,都会形成惯性,形成思维定势。这件事同时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左”的东西还有市场。我以为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不能用发展的观点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没有指导思想、没有“主义”不行,毋庸讳言,必须高高举起。同样,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绝不能依靠本本,用僵死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形势发展了,变化了,针对发展了的形势,我们的同志不能用发展的观点全面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精神实质,而是死守本本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结论,就是“左”的思想的一个来源。“两个凡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其二,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文化一旦被一个社会接受之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便自然地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识,不再怀疑它的正确性,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比如至到今天,不少人同样不会再去思考社会主义就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这个命题,不管我们讨论的社会主义是处于何种阶段的社会主义。就传统文化看,宗法等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巨大。因此,中国人的心态一般都比较重视前贤和先王的遗训、主张,孔夫子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六经之一的《孝经》“卿大夫章”引用了他的一段话,同样具有代表性意义。孔夫子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孔子认为,作为卿、大夫凡事都要符合先王所规定的服饰、言语、德行,说遍天下别人抓不住言论错误,走遍天下不会招致别人的嫌恨,这样才可以守住祖业俸禄。这样一种观念对历代官吏阶层具有很深的影响,也成为某些“左”倾思想赖以生存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一定是神,但他是“皇帝”;相当比重的干部中将上下级关系处理成了父子君臣关系。

其三,从无数的教训和经验中,社会 and 我们的理论本身不断地给我们以这样的暗示:“左”不吃亏,“左”别人抓不住你什么,“左”是革命性、坚定性的表现,从“左”中自己可以捞到诸多好处。而右则不然,右就会受批评、批判,就会倒霉。因此,直到今天,虽然“左”的言词少了,甚至不见了,但是从许多人的工作操作和讲话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深层的思维律动。

二、同一比分别好。

建国以后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思想给我们留下的思维惯性是多方面的,同一性是这些惯性思维的集中的体现,在许多干部的头脑中现在还深深地印着求同一、求一致的绝对化思维定势。表现在思想上,处处求一,不允许不一致的思想见解,更不容许相反的见解存在,对不同的声音没有包容性,许多人听从一种声音,自己不愿动脑,嘴上说的是领袖的话,报纸上的话,唯独没有自己的话。因而便出现了一种作起报告来阴阳顿挫,字正腔圆,强弱起伏,张弛有致,但却空洞无物,没有新话,尤其没有自己的新话和思想的火花。表现在经济工作上,搞“一刀切”。中国如此之大,各个地区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等有较大区别,但是一声令下,不管你天南地北,“以粮为纲”,大家都搞粮,牧区也犁了草场种粮食,不能因地制宜,不能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大炼钢铁,全国上下都建炼钢炉,于是有煤的烧煤,没煤的地方便毁林炼钢,有的地方几乎将森林都砍光了;农业学大寨,大家都修梯田,有些植被薄的地方,本来如旧耕作,还有点收成,但一旦破坏了植被,挖出了底层的砂石,这块地便废了。现在搞“股份制”,由于受这种同一性思维定势的影响,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一风吹”、“一刀切”、“一窝蜂”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表现在文化上便有了同一性模式,人物形象上搞“高大全”,千人一面,千口一词,导致“假大空”,“文革”中便有了“八个样板戏”一花独放,扼杀了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艺。就连学校、农村公社、生产队等也搞高度统一的营、连、排、班编制,人人成了服从命令的“战士”。同一性的思维

惯性表现在政治生活中有强烈的排他性,在一单位中,在一个班子里,容不得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同就会被视为反对,搞对立,双方都十分警觉,警觉的第一个反映不是他如此思考我又这般想法,是否有利于工作,而是“他是不是要搞我?他是不是在搞我?”;在用人问题上的同一性,则搞清一色的“自己的人”,搞能够同一声音、同一行动的人。在指导思想求同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才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正常的和不可能的。有的甚至一有不同意见便视为异己,想方设法以挤掉和搞掉对方为目的,使我们的工作遭受诸多的损失。同一性思维惯性也是我们“窝里斗”、内耗的重要根因之一。

三、多比少好,快比慢好,近期比长远好

由于上级领导大多看材料,从材料断形势,观全局,察干部,因此“数字出官”已成为一种遍见的现象,且有经久不衰之势。数字和晋升连在一起,那么图多图快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时日一长,风习相沿,就成为干部的一种自然的思考方式。从形式上看,图多、图快、图眼前利益,并没有多少错处。但是,其中的危害有三:一是这个多、快成为体现政绩的主要硬件,成为任用干部的重要材料,从“数字出官”转向“官出数字”,有了本质量的变化,埋下了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投机取巧的根因;二是图多、图快成为不重质的主要原因,埋下了多而次、快而次的根因;三是由于干部实际导向上的求多、求快,便成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的根因。为官一任三五年,不少干部急于出政绩、放卫星,只顾眼前乌沙高,不顾将来坑后人,为可持续性发展埋下了后患。这也一定程度地养成了一部分干部的上级重于群众,因为上级看数字,群众不看数字;关系优于“主义”,因为关系可以有效地宣传数字;表面重于实质,因为只要报告上、材料上的数字有了,牌子亮出去了,具体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了。因此,练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就成了一个屡究不止的顽症,培养了不少演说家,却了不少实干家。因为重实

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卫星可放,重实就不可能说假话,重实也就不可能不顾忌子孙后代的利益和事物的规律性;反过来讲,假如我们有了个讲假话的环境,那些实干的人也就感到没有趣味了,也就要考虑自己额头汗水的份量了。

从问题的另一面看,图多、图快、图眼前利益,也是群众中最易出现的行为问题。因为,在一些群众那里,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目前的处境。既然要改变,那么就越快越好,因此,那种一蹴而就,“一步登天”的思想便与之俱来,假如领导干部也有这种观念和上述偏向,极易引发群众的狂热、浮躁、盲动,甚至会酿成事端。

四、无功比有过好

这种思维形成定势,大约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多讲中庸,不偏不倚为宜。乡谚所谓“不骑马,不骑牛,骑上毛驴最自由”,马太快,牛太慢,毛驴居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思想。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对自身和工作多采取这种方法,不图最前,最前则会招来“枪打出头鸟”,不利;也不图最后,最后则会“杀鸡给猴看”,继而墙倒众人推,同样不利。不敢闯,闯是在无路的地方踩路,不免失误;失误不免有过,有过是绝对不可取的,求稳怕乱,居中以求进退是干部较为普遍的心态。如此,就形成了一种干部不是力争最先进、最优秀的氛围,以保持我们工作的最佳的精神状态,而是甘居中流,警戒最后。这本身就降低了对自身的高标准要求,不符合当今世界竞争的需要,也不符合我们推进伟大事业的需要,这种环境也扼杀了一些有才之士的才华。二是长期的“左”的环境中形成的一种干部心态,也与我们提拔任用干部的一些条例有关——在那些动乱的年代,干部人人自危,“危”什么?唯恐自己有错误。虽然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一系列干部任用、培养、处理制度,但实际生活不是这样。无功,不要紧,平平庸庸,也可以维持局面,这儿政绩平平,没干好,就可以变个法儿调到另外一个

地方去干,好歹“能上不能下”, (当然因错误、过失、犯罪下台的大有人在,也均在意料、情理之中,但是因平庸而下台的大概现今不多,而平庸者得到提拔的倒不鲜见);可是有过就不行,一有过失,一装档案,这个干部头上就划了一个问号,甚至这个干部的升迁之路便划上了句号。因此,大家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心灵深处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把功夫做在了“无过”上,便出现了不敢冒、不敢闯,该拍板的不敢拍板,该个人拍板的非要大家商量、会议通过——自然这种会议不是在发扬民主,而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办法。因为一个干部一旦有了过失,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无论他的能力和他一生的政绩如何,这个干部的脑袋上就有了辫子,在党内生活不太正常的时候,这些“辫子”就成了打倒自己的石头。这种思维惯性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文过饰非、抢功诿过,是极其可怕的。

影响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惯性思维不仅仅是以上这些。实质上这些惯性思维同时也是一些具有价值观形态的东西,只是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形式而存在,成为我们不少干部的价值标准和思维习惯,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有所改造,有所克服。修正的办法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要真正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

1、辩证思维。真正科学的哲学才可以给我们以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没有辩证的思维能力就不可能把握事物辩证运动变化的规律。黑格尔说:“思辨的东西……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尚未经训练的、不自觉的思维能力来说,也是最困难的方面。”关键是训练,通过训练形成自己的辩证思维方法。

2、系统思维。每一类型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系统,一大系统都有着若干小的系统组成,小系统又有更多的小小系统组成,充满了层次性、联系交融性。平常我们讲要胸怀大局,胸怀大局就有必要了解我们的社会的各个不同的系统,各个系统的排列与联系,本系统在整个大系统的作用和地位。这样我们就会更加自觉地从大局

着眼,从而服从于大局,服务于大局。

3、立体思维。领导的责任之一就是“弹钢琴”,没有立体思维就很难弹好钢琴。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思维形式。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下,虽然已经形成了辩证的思维,但它与现代社会的丰富性是无法比拟的;人们的思维跟其它的社会科学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也要不断地向更为复杂也更为进步文明的方向迈进。因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也要具备立体的思维方式,善于用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4、动态思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中发展变化着。运动也是事物的本质属性。

5、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切科学思维的基础。没有思维的准确性就没有决策的准确性,同样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再高潮的思维也将一事无成,甚至会走向反面。

第二、要真正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出以往社会丑恶的官僚政客的行为和习性。1、一切为掌权。1)顺则为了升迁;2)逆则为了保官。2、掌权是为了捞取利益。1)追名;2)逐利——物质财富(吃、住、金钱);3)美色、享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由社会最优秀分子组成,因此自身要讲礼义廉耻,要讲志存高洁(手洁、身洁、心洁)、气节情操风范,要讲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时要处理好随时伴随自身,又与我们的综合、辩证等思维有关系的十四种关系:1、民主与集中;2、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率;3、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4、公与私;5、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人民;6、全局与局部,系统与系统;7、长远与眼前;8、市场与计划;9、自力与他力(内因与外因);10、同一与兼容;11、继承与创新;12、政治与业务;13、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14、重心工作与一般工作。

树立科学的思维,克服一些不良思维惯性对我们的影响,会使

我们更敏锐、更智慧、更轻捷,以推进我们伟大的事业向前发展。

作者附记:

藏学系成立五年了!按照“逢五逢十”的纪念原则,总要庆祝一番。系里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同志要我写几句话,摊开纸来,虽往事如云,心潮起伏,却笔下艰涩,难以成文,而时间只有三五日之多,恰又值虎年新春,亲友往来,难有闲暇,权且以上文代之。这篇文章主要谈干部的惯性思维问题,但愿它能对藏族干部和藏学研究者有一点参考。在此我谨代表藏学系全体师生,向五年来指导、关心、支持、帮助藏学系发展进步的领导、朋友、同志和社会各界表示诚挚的谢意。